

# 铁路图上的爱国者与强国梦

## ——浅析孙中山的《中国铁路全图》

吴干

在中国铁道博物馆里收藏并展出一张非常珍贵的铁路规划图，它因年代较久而略显泛黄，且有轻微破损，但整体保存基本完好。这张铁路图长105厘米、宽95厘米，内中用红、黑两色线条勾画的铁路线路清晰可辨，特别是红色线条分布密集且广泛，遍布整个中国版图。这张铁路图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1919年发表的《实业计划》中的《中国铁路全图》。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为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勾画的宏伟纲领，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1919年2月完稿，发表于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它与《孙文学说》和《民权初步》合称为《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国铁路全图》是《实业计划》中的重点所在，是孙中山先生对铁路发展规划的真实反映，此图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地图中也被称为“建国方略图”，“中山建设地图”或“孙总理实业计划图”，从名称即可见其作为整个著作精华和灵魂的地位。在当时的条件下，孙中山先生擘画的这张铁路蓝图确实是难以实现的，他有关铁路的精辟论述、编制的铁路发展宏图、倡导的开放筑路方针，对中国铁路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兴办实业 始于铁路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门户的被迫开放，以铁路为重要代表的西方现代交通知识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但并未引起政府和工商界的重视。直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加强，现代交通所发挥的巨大影响，才使中国人感到震动。然而真正认识到现代交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人却寥寥无几，孙中山则是其中之一。

孙中山先生一再强调中国要发展铁路，大张旗鼓地倡导兴筑铁路，这同他坚信“实业救国”理想是密切相关的。1891年，他在所撰《农功》一文中提出“亟宜造铁路”以屯田戍边的主张。1894年6月，他在《上李鸿章书》中直言：“地球各邦今视铁路为命脉矣”，大声疾呼中国修建铁路，实现商兴民富国强。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时，孙中山就研究工业发达国家的铁路发展经验及列强侵略中国铁路路权的历史教训，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铁路在西方国家走向鼎盛，成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成为世界文明进步的亮点。在国外，他每到一地即取其与图，“留心比较世界之铁道，



孙中山考察京张铁路

实偏有所嗜”。

辛亥革命石破天惊，迎来了共和新政，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4月1日，为践行誓言他辞职引退。他说：“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将致力于发展中国铁路事业。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举办的欢迎会上，他强调：“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后又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一职，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全权筹办全国铁路事务。孙中山曾在不同场合反复论述修筑铁路的重要意义，认为铁路建设乃一国富强之基，并作出了“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的论断。在他看来，发展实业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而首当其冲之策则是建设铁路。



《中国铁路全图》封面

对外交流的枢纽。整个铁路网络可分为“六大铁路系统”，即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和高原铁路系统，从而构成一个完整、发达的铁路网络。在这张《中国铁路全图》中全部采用红色实线标画。

俯观铁路全图，这个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便一目了然。铁路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尔海；高原铁路包括拉萨兰州线、拉萨成都线、拉萨大理车里线、拉萨拉萨宗线、拉萨亚东线等16条线路。另外，各省之省会均成为铁路中心，路线将由此种重要之城市向各方分射而出。从每个省会出发之路线，将多至八九条不等。通过东北、东南、西北、高原等铁路系统，分布于东、南、西、北四角为横向辐射布局，并与邻国铁路接轨，从而形成一个内连全国、外通全球的流通网络。如图所示，今日的蒙古国和原唐努乌梁海地区均属中国版图之内，所以西北铁路系统几乎一半铁路线路铺设在蒙古境内。此外，孙中山先生还计划建设中国的水运系统和公路运输系统，使之与铁路运输相互连接，陆港联动，相辅相成，建成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络，从而使中国的人流、物流畅通无阻，推动中国其他各项实业的发展。

### 宏伟蓝图 统筹筑路

1919年秋，一份雄心勃勃、激动人心的中国经济崛起方案见之于众——它即是孙中山发表的《实业计划》。在这份纲领性的计划中，他从放眼世界的战略高度出发，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提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略。其中，对中国铁路发展进行了详细规划，计划修建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的铁路，目标是建成“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的铁路网，并以新建北方（位于渤海湾）、东方（位于杭州湾）、南方（广州）三大海港作为铁路网

### 融资引才 开放办路

孙中山先生在铁路图上选线时曾强调四项原则：一是“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借助国际力量共同开发；二是“必选国民之所最需要”，急需先修；三是“必期抵抗之至少”，先在社会条件好的地方修路；四是“必择地位之适宜”，有利于通道建设和连接成网。就资金而言，他对10万公里铁路预估的资金需求总量为60亿银元，以当时汇率来看，约合20亿美元。辛亥革命后要推进《实业计划》中的铁路发展规划，面临着技术、人才、资金等重重困难。在国弱民穷的形势下，如何开创修建铁路新局面？孙中山明确提出开放办路的方针，他认为“现今世界日趋于大同，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留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这个方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谈到利用外资，孙中山先生列举了三种具体方式：一是借款修路，国人自办；二是招股修路，华洋合办，设立铁路公司，主权属我；三是批给外人承办，期满铁路无偿收回。他认为最后一种方式为好，就是经国家批准的铁路项目，实施时由中国铁路总公司与外商签订合同，公司负责定购地交给外商修筑，外商40年特许经营期满后无偿移交给中国。孙中山特别重视在利用外资中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在中国铁路总公司与外商签订的合同中，有具体条款予以落实。此外，他多次明确强调：“我们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试以铁道论之，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命矣。”为此，必须采取立法建制措施，有效防止少数资本家之垄断。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孙中山《中国铁路全图》中的强国梦想并未能在其生前实现，但他用宏大完善的铁路规划详尽的实业计划，向民众描述了一个繁荣富强、独立自主的未来中国，《中国铁路全图》凝结了这个梦想，以一张形象的庞大的铁路规划图，反映了先生“铁道立国”的坚定信念和理想，更承载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振兴复起的强烈愿望。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下，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这个蓝图早已实现，中国人民创造的许多成就远远超出先生的设想。祖国大地上，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齐，稻麦遍地香，神舟遨太空，国防更坚强。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建设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 考古出土文物助力文化润疆

帕孜来提·买买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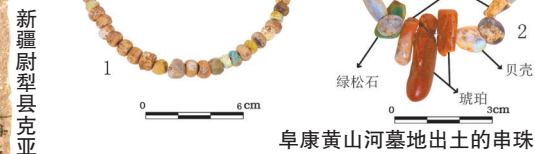
新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古代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历史上许多古代民族和族群在这里聚居与繁衍生息，在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和宗教的传播，因此保存下来的古代文化遗存尤为丰富和多样。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考古文化有着其特殊性和重要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自然条件恶劣、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几代考古工作者，根据田野调查在天山南北广阔区域先后发掘了古遗址、古墓葬和古城址数千处，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和科研标本，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填补了许多空白，为深化和拓宽不同时期新疆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信息。众多发现成为新疆乃至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资源。可以说，新疆考古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加快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利用好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对打通从考古发掘到保护、研究、阐释、展示、传播的学科全链条，促进考古发掘、学术科研、阐释展示和社会服务的良性互动，积极推动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度融合，形成中华文明探源的新疆方案有着重要的作用。

新疆不仅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重要通道，也是当前“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段，考古工作历来备受国内外考古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各民族儿女共同创造璀璨夺目的五千年文明史，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疆作为我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新疆各民族间不断的交流交往交融，实现了文化上的兼收并蓄，形成了在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中又各具特色的生动局面，使其呈现多元、开放、融合的特点。

考古发掘研究和阐释的目的就是有力推进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的转化进程，充分利用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活化利用出土文物，围绕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进一步发挥好出土文物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历史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本着这一落脚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一直非常关注和支持各级博物馆的展陈工作，尤其在提升各级博物馆文物数量、发挥文物在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效和务实的工作。向各级博物馆借展或移交在全疆各地考古发掘中所获各类文物上万件（套），使各级博物馆在用最新的考古发现实证新疆历史文化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更为丰富。在这些考古成果的支撑下，近年来各级博物馆相继举办了多场展览，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在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和田地区博物馆举办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和田历史



阜康黄河河墓地出土的串珠



托里县克拉玛依一塔城铁路沿线墓地出土的青铜马具

文化陈列”，用丰富的考古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阐释了和田历史的发端，生活的人群，各时期人们的生计业与生活所创造的文化及其作为丝路明珠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同时也通过一些代表性文物充分诠释和彰显大一统中原王朝对和田的管治和经营。这些文物在润物细无声地讲述和田历史文化的同时，彰显中原文化的引领、表明大一统中原王朝对和田的管治时期是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由于在主题的确定，文物的选择与搭配，展陈方式的新颖与独特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和田历史文化陈列”展荣获第十八届（202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博物馆数量得到持续增长，许多地方相继建造了颇具规模的博物馆馆舍，其功能也从最初的收集、保管、简单的展示发展到研究、阐释和不断提升展览水平，使展览形式更为多样，内容更为丰富，使得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逐渐成为人们学习的重要场所。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各级博物馆的藏品来源变得更为丰富与多样，举办的各类主题展览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以“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为重要抓手，各级博物馆在做好“文化润疆”工作中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展现了其自身亮点，但依然存在着一些困扰其发展的瓶颈问题。如个别县级博物馆由于本身基础薄弱，现有的藏品种类单一；有些区域考古工作开展有限，现阶段仍依靠考古发掘给予补充完善还有一定的难度。因而在举办新的展览时，仅靠考古发掘品就存在历史断档，难以构建以编年体模式的完整历史文化谱系，不利于观众对以纪年为主线之历史脉络的认知，这也是新疆文物考古工作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东西方文化板块碰撞的地方，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并存的特征在文化遗产上有着充分的表现。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要本着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负责的态度，研究文化遗产的价值，探讨其保护工作的多种方式，制定科学的操作方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考古出土文物在新疆各级博物馆的展示利用得到更好的保障，在实施“文化润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邵阳市邵伯窑青瓷的审美初探

李中美

陶瓷，是中国的“国家名片”之一，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陶瓷所蕴含与释放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其物质本身，更多的是代表一种人文底蕴和审美境界。

湖南省邵阳市邵伯窑址主体位于邵阳市大祥区板桥乡邵伯村，距市区约10公里，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该窑址始烧制于北宋时期，窑身为馒头窑，龙窑。窑具大量使用垫圈、垫饼等，器物主要有碗、盘、盆、钵、盘、壶、瓶、杯、罐等。通过调勘发现，邵伯窑址为资江流域烧制较早、规模较大的民窑。

邵阳市邵伯窑址由于其地理位置比较特殊，而且自然气候条件也有利于文物保存，所以窑址主体架构保存良好，出土的文物保存也比较完整，特征相对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器型美观度明显提升。经过专家论证显示，邵阳市邵伯窑所烧制的瓷器基本以民用瓷器为主，所生产的瓷器多被民众直接用于生产生活中。从出土的相关瓷器外形来看，无论是流线的造型还是色彩搭配，以及器型美观度，与唐代的“白瓷”相比做工更精巧，质感更细腻。这些精美的“民窑”瓷器足以说明，在宋代我国的制瓷工艺已经发展到一个日臻成熟的鼎盛时期。

二是量产规模化效益提高。在邵阳市邵伯窑址的发掘现场可以看到，直接用于陶瓷生产的垫圈等器物数量众多，其数量、体量也较大，呈现种类泾渭分明的特征。这也印证了邵伯窑在当时的陶瓷生产已经具备了量产式的规模化生产，其规模化的量产为瓷器从贵族奢侈品消费逐渐延伸到平民日常生活，起到了巨大的助推效应。

文物学家在谈及宋代瓷器时，多赞誉宋代瓷器所表现的是“出彩美”，而其中的“彩”，绝非是现代眼中的色彩，而是代表了釉质均衡美感艺术之美。这种“出彩美”往往非常简约，简约到让青瓷成为宋代瓷器的标志性符号。从邵伯窑址出土瓷器分析宋代青瓷的审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唐代白瓷为基础的色泽结构延伸。据考证，在“邢窑”出土的唐代陶窑窑址中有大量的陶瓷制品，其性质同邵伯窑址类似，多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使用的陶瓷制品为主，也属于“民窑”。然而，“邢窑”瓷器的色彩较为单一，基本以白瓷为主。而邵伯窑址中发掘的陶窑则完全不同，除了充分展示其宋代青瓷技艺的特征之外，其器表不见刻花或印花的装饰，以原本的釉色和器型为美，器表多布满开片的蟹爪纹，体现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的审美境界。

由此可见，宋代青瓷瓷器的色泽结构工艺，确实是传承了唐代白瓷工艺，但在色泽结构的组合与搭配方面却又明显表现出其截然不同的一面。通过综合分析瓷器结构的造型比例，优化和调整其色彩形式美，从而让看似简约的单一色彩从不同的角度、而产生、层次上彰显完全不同的视觉色彩，而强烈的视觉冲击，使其具有一抹特殊的兼具艺术与生活的立体美。邵阳市邵伯窑青瓷，完整地继承了这种风格。



匣钵



支钉圈



青瓷



青瓷



青瓷



青瓷

以大道至简为特征的装饰效果突出。民窑瓷器，大多直接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所以对其实用性要求和最为突出，但并不代表这些瓷器不需要修饰或者装饰。从邵伯窑出土的瓷器可见，尽管囊括了碗、盘、盆、钵、盘、壶、瓶、杯、罐等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些瓷器大多只有简约、单一的装饰，表现出匠人对于瓷器所独有的艺术理解。文物鉴定专家按装饰方式把这些器物分为胎装饰、釉装饰、彩绘装饰、书法装饰等，同时又有刻、印、划、戳、剔、贴塑、镂雕等技法，这些技法或单独使用，或几种结合使用，充分体现了陶瓷的装饰美与实用美。这些技艺在陶瓷的制胎阶段十分简单，不过恰恰就是这种大道至简的方式，让这些陶瓷制品拥有了丰富的装饰性特征，同时也为这些直接应用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陶瓷制品平添了立体美。

以自由奔放为特点的形式美特征外溢。宋代“官窑”瓷器的纹饰丰富多样，花卉是其重要装饰内容之一，龙、凤、鹤、麒麟、花鸟、婴戏等是常见题材。而邵伯窑出土的具有这种特征的瓷器种类并不多，并不能说明这里烧制的瓷器不符合当时的“主流风格”，而是说明宋代“官窑”瓷器其纹饰局限性较大，诸如邵阳市邵伯窑这种典型的“民窑”瓷器展现的是大众化、平民化，以自由奔放为特征的质朴美感。如瓷碗，碗心常印有单个文字或简单花卉，窑具用匣钵和垫圈的组合，这些特征都与湘江流域衡州窑类型窑址相近，而且其制作手法无论是粗划线还是细划线，线条都能够明显表现出看似随心所欲实则整齐划一的自由特征，这种不拘一格的瓷器生产方式，可以确定其划线是匠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匠人娴熟的技艺让这些瓷器成品的美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梳理邵阳市邵伯窑出土的瓷器文物可以发现，宋代后期，尽管民窑青瓷的装饰手法仍然是以“刻花”形式为主，但其纹饰的题材也明显有所减少，这虽然与当时的人文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制瓷匠人对于陶瓷烧制的理解，从前期的双面刻画转向单面刻画，从繁琐逐步向简约转化，尤其是在制胎阶段，主要以“薄胎厚釉，以釉色取胜”为代表的造型，同宋代早期显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其精致、精巧的形态美和简练、端巧的形意美，铸就了宋代青瓷沉着与典雅并存的美学风范，为后世了解、认知宋代青瓷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与实物佐证，也为陶瓷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宋代官窑瓷器讲究釉色之美，尤其强调釉色的基础性色彩结构，致使留存下来的瓷器大都表现出强烈的“重色”视觉效果。而以邵阳市邵伯窑为代表的宋代民窑青瓷作坊生产的瓷器在纹饰上都有其自身特点，虽然色彩没有官窑丰富，其视觉色彩结构特征没有官窑冲击力，然而完全基于民众生活需求出发的自由奔放式特点，让两大窑瓷体系相辅相成，以此形成较为完整的宋瓷青瓷文化。

综上所述，以青瓷为代表的宋瓷具有高深的审美境界，而以邵阳市邵伯窑为代表的民窑宋瓷则展现出温润淡雅和肆意洒脱的风格，为陶瓷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思路 and 境界。